



(上接第22版)

殷蔚伯：他是严谨的老师 也是平易近人的朋友



殷蔚伯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首席专家殷蔚伯教授表示，谷教授在学习和临床工作中对年轻医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回忆道：“当年我刚到放疗科工作的时候，谷教授在门诊收治了一位扁桃体癌患者。患者走后，他问我，你了解扁桃体癌吗？那时

我刚毕业，对扁桃体癌没什么概念，答不出。谷教授也不恼，只是告诉我要去看哪些书，否则连病历都问不出来。以后，我晚上常常要看书到一两点，看完书第二天再去问诊。”

谷教授认为，放疗科是一个临床科室，放疗科医生首先须是临床医生。他要求年轻医生都要学会问诊、查体，并结合影像、化验结果做出独立的诊断，给出治疗方案。而在年轻医生写完病历后，谷教授会来一一检查，并指出其中的不足，让年轻医生获益匪浅。殷蔚伯说：“为了更好地检查出鼻咽癌患者的病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医生一到晚上就用间接喉镜、间接鼻

咽喉镜在对方身上练习。”

“一般来说，放疗科医生所见到的肺癌，就是X光片、CT片、MR片子中的影像。但肺癌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却没见过。于是，谷教授就联合胸外科、头颈外科等科室组织综合查房，查房时，胸外科会把一个星期所有手术切除的标本全部拿来让我们观察，这样一来，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就更深刻了。”

殷蔚伯说：“谷教授把全部心血都灌注在了他的学生身上。他虽然在工作中严格，但生活上却很平易近人，对年轻医生也非常照顾。到了周末，我们一群年轻医生经常会到他家里聚餐、打桥牌呢！”

王绿化：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院长王绿化教授表示：谷铎之教授是我们专业的老师，也是我们人生的导师。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和对放射肿瘤学事业发展的不懈追求，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放疗人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王绿化说：“谷教授在生活上自然、朴素、慈祥，在学术上严谨、敏锐、仁厚；称得上是一位德如佛、才如仙的大医。”

王绿化介绍，1986年，在吴恒兴院长的支持下，谷教授带领全国同道，成立了中华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学分会。从此，放疗界的同仁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建立了

学术交流的平台。经过32年的发展，如今，学会已不断壮大，并向着精细化、专业化不断迈进。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健康中国的国家大战略背景下，放射治疗将迎来高质量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我国的放射治疗能力和水平与国际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患者得到了高质量的医疗照顾。

王绿化说：“随着国际交流广泛深入的开展，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如今，中国代表团已成为美国放射肿瘤学会年会（ASTRO）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当选Best of ASTRO。2003年以来，欧洲放射肿瘤治疗学会（ESTRO）培训班已在中国举办15次，对我国的继续



王绿化教授

教育和国际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推动作用。2008年，中美放射肿瘤协作学会（SANTRO）成立，为中美放射医师搭建起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

王绿化表示，放射肿瘤学于2014年成为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科。2017年，放射肿瘤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得到落实。将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放疗人在谷教授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是对谷教授最好的纪念。

李晔雄：峥嵘岁月中的“大科”创始人



李晔雄教授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李晔雄教授介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始建于1958年，原名日坛医院。建科之初，谷教授等一批老前辈们手拉肩扛，自己动手安装Co-60治疗机。而那时的Co-60机经常存在卡源的风险，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往往会受到很大剂量的辐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老一代放射治疗专家们依然为推动中国放

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李晔雄说：“那是一段峥嵘岁月。”

李晔雄介绍，1983年，日坛医院迁至龙潭湖院址。谷教授在新院的规划中便大胆地设计了8个加速器机房，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放疗科。如今，放疗科已成为一个由临床治疗、放射物理和放射生物室三部分组成的专业科室，有一支由医护人员、物理师和工程师等193人组成的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并产生了一批国家级学会的主委、委员。设备上，放疗科目前拥有8台直线加速器，50余台逆向调强计划设计系统，1台近距离治疗机和1台热疗机等一流的设备和完善的管理结构。在鼻咽癌、小细胞肺癌、食管癌、恶性淋巴瘤、早期

乳腺癌保乳治疗等方面，均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放疗科在临床和基础科研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大量成就。1959年以来，放疗科参写、参编、主写、主编的肿瘤专业和放疗专业书籍已正式出版发行的共43套44册；参译、主译专业书籍已出版的7套7册。仅2008~2013年间，科研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内外知名专业杂志上的有近310篇，其中SCI论文82篇。李晔雄说：“饮水思源，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吴恒兴院长和谷铎之教授等一批前辈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就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放射治疗科今天的成长。”



张福泉教授

张福泉：新竹高于旧竹支 全凭老干为扶持

北京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张福泉教授表示：1986年，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同年，北京医学会放疗分会也在谷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

张福泉回忆：在分会创立之初，谷教授便远见卓识地提出，北京经济水平高，医疗资源集中，要以北京为中心带动全国放疗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分会在成立之初就连续举办了17次主治医师学习班，年近古稀的谷教授共参加了15次。那时候讲课没有讲课费，也没有PPT，谷教授靠着一杯茶水，一讲就

是4个小时。从当时的学习班中走出的几百名学员如今早已成为各医院的专业骨干，乃至全国放疗领域的领军人物。

张福泉表示，谷教授对北京放疗事业的另一贡献就是近距离治疗。1989年，谷教授率先从荷兰引进近距离治疗机，将近距离治疗扩充至30余种肿瘤和解剖部位。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等也陆续引进后装治疗，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掀起一股“后装热”。

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谷教授与高能物理所合作，牵头成立快中子治疗协作组，在北京开展多中心协作，开创了我国高LET治疗的先河。

张福泉动情地说：“谷教授对北京放疗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北京几家大医院放疗科建立与发展过程中都凝结着谷教授的心血。无论是学会的建立与发展，还是科室的发展与传承，无不深刻地继承着谷教授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缅怀谷教授，学习谷教授，就是要将谷教授的精神发扬光大，将谷教授的事业传承发展下去。”

青年医师感言



金晶教授

金晶：他“调皮捣蛋”的经历 拉近我们的距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务处处长金晶教授回忆：

“我和谷铎之教授只相处过短短8个月时间，那时我才刚刚成为主治医师，很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得还不够扎实，有的操作还不会独立进行。有一次，我和谷教授接诊了一位需要进行食管内后装治疗的患者，可那时我还没有独立进行过食管后装的操作。”

谷教授问金晶：“你敢不敢做？”

金晶：“我不敢……”

谷教授说：“没事，你大胆做，我就在旁边，有问题我马上接手，出事我负责任！”

在进行后装治疗时，施源器是通过患者体外进行调整，越贴近病变的位置治疗效果越好，这就需要医师往返于透视架和治疗床之间反复进行调节，谷教授对金晶说：“我就在这，你到里面透视，你告诉我往哪调我就往哪调！”于是，谷教授暴露在X射线下调整施源器的方向，而金晶则在放射防护屋子里“指挥”谷教授。每当回忆这一幕，都让金晶感动不已。

金晶表示，谷教授在专业上要求很严，但却从未嫌弃过自己的学生，而是非常努力地想让年轻医生学得更多、吸收得更多、做得更多。与谷教授在一起，她一开始时不敢多说话，但谷教授在工作之余经常与大家“分享”他年轻时“调皮捣蛋”的经历，迅速拉近了与年轻医生之间的距离。

金晶认为，谷铎之教授除了对我国放射肿瘤专业和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最值得后辈学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她说：“谷教授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我们晚辈医生学习的典范。我永远怀念我的谷老师、谷大夫——谷铎之教授！”